

危機與自我的形成 ——論 Oevermann 的社會化理論

黃聖哲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摘要 德國社會學家 Oevermann 的社會化理論是德語教育社會學界的主流思潮，但一直未被中文學界所注意。本文旨在引介他的結構詮釋學取向的社會化理論，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學的自我理論，以解決社會學理論對主體形成問題解釋的爭議。Oevermann 的社會化理論，建立在危機式的生活實踐理論模型上，社會化過程指涉的是由規則所引導的社會化，自我則是在學習與他人共處及與世界交往的規則。規則的學習，一方面是內容的內化；另一方面，則是結構的內化，二者必須嚴格區別。自我形成的關鍵在於內化生命史中有作用力的規範、規則與價值模式。主體的建構則有賴於克服生命史的危機，產生新的行動結構，創造新的事物。

關鍵詞：客觀詮釋學、結構詮釋學、教育社會學、社會化、社會理論

前言

社會化研究在台灣的社会學界一向不被重視，無論理論的或經驗的研究都相當匱乏。標準化的測量工具的大量且廣泛的使用，可能是此一重要的社會學研究領域不太受重視的原因之一，社會化（尤其是社會化互動）非常不適合標準化的研究方法，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個別、具體的行動者，特別需要個案取向的方法考量。



德國社會化研究與教育社會學的重要領導者 Ulrich Oevermann 由其經年累月的研究實踐所發展出來的「客觀詮釋學」（結構詮釋學）學派所提供的社會化理論，有助於我們建構未來社會化研究的準則，其大量個案重建取向的經驗研究，也可以提供未來學者的研究參照。¹

客觀詮釋學學派認為，社會化在於形成具有說話與行動能力的主體，社會化問題在理論上其實是一個自我形成的問題，一個人的自我是如何形成的，小孩從出生到青少年危機的階段的結構屬性為何，個體如何克服青少年危機由小孩蛻變為成人，成年人的自我生命演進的進程的結構特性為何，凡此皆為 Oevermann 社會化研究的重點。²

對 Oevermann 而言，社會化最核心的問題是「經驗的社會構成」的問題，尤其是「一個個體的新的經驗是如何構成的」，換言之，新的事物是如何出現的。回應上述問題，他提出其獨創的生活實踐的理論與「經驗的社會構成」的理論，將問題歸結於存在的核心結構—危機。生命史被視為一種危機與危機克服的序列，而社會化即是一連串的危機克服的過程。

一 社會化概念的歷史背景

在此，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社會化研究的社會學史背景。社會化的概念是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際出現的，當時的思想家如法國的涂爾幹、美國的 Edward A. Ross，心中掛念的是，如何將每天大量出生的「野蠻人」道德化，整合到社會控制與社會規範的機制之中。

作為一種社會學對霍布士式問題的回應，社會化研究是在行動理論被建立之後才得到應有的重視。個人的社會行動被回溯到



個人內在的主體性根源，而這是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才能獲得的。在韋伯與派森思 (T. Parsons) 的行動理論中，社會化得到系統性的重視，特別是在 Parsons 的系統理論中，研究重點被轉移到個人內化的價值取向與角色規範的強制性問題。在角色理論的典範中，社會化的問題因而也被窄化為社會的內在價值與行動規範的外控問題，個人行動的自主性鮮少得到關注，這種外控與自主性的矛盾使得派森思式的系統理論變成一種保守的理論，成為政治上用以控制社會的意識型態力量。

這種將社會化視為由社會將其強制性的要求移植到個體內在行為結構中的觀點，在1970年代之後逐漸受到質疑，而將社會化視為社會有效的價值與規範的內化過程的觀點也無法充分解釋「偏差」的行動與「創新」的現象。這種社會化的概念尤其無法解釋社會變遷，因為「社會化」一旦大獲全勝，歷史將陷入停滯的狀態。

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哈伯瑪斯在德國社會學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其實是德國社會化研究的理論先驅。眾所周知，德國社會學在歷經二戰浩劫之後，在1960年代才藉由接收美國社會學的研究典範而慢慢恢復生機。依據筆者在法蘭克福求學期間的所見所聞，哈伯瑪斯1960年代初期在法蘭克福大學帶領年輕學子重新詮釋米德與派森思的著作，並且在黑格爾與佛洛伊德的精神中，逐漸找到其日後溝通行動理論的基礎。

哈伯瑪斯1968年在所開設的有關「社會化理論」的講堂課中，顯示了其對 Parsons 角色理論的高度重視。哈伯瑪斯引用 Parsons 「社會系統」一書中的討論，認為「社會化是在與社會行動的角色概念的關係中被界定的。社會化被理解為一種整合於既有的角色體系的過程。」³ 延續 Parsons 的觀點，他認為社會化是一種學習過程，在其中行動能力的主體內化價值取向，形成扮演社會角色的動機。⁴



他正面肯定角色模型的優越之處在於能夠建構一個社會學獨有的領域，行動主體必須被視為「角色負載者」(Rollenträger)，並避免心理學式的行為理論，不能將行為當作是一種特定人格結構的外在表現，而是回到系統理論的觀點，將行為設想為「在一個社會行動系統中的過程」。⁵

哈伯瑪斯也特別提到，美國的米德派學者對於「角色界定」與「角色詮釋」概念區分的批評，並強調「角色接收」(role-taking)與「角色開創」(role-making)之間的辯證關係。⁶在角色理論的典範中，社會化被設想為一個在互為主體性的脈絡中自我認同的形成過程。在童年的發展階段，角色行動的基本要求必須要被完成。在次級社會化過程中，有賴於初級社會化累積的基礎，自我認同必須在克服社會環境與成長條件的危機中逐漸形成。⁷

他認為，溝通行動的自由程度將左右這個過程的成敗。另一方面，並沒有忘記霍克海默關於「威權家庭」的經典研究，哈伯瑪斯也指出，道德意識往往只是反思性的父母親權威的內化。家庭內的溝通形式因而對社會化的過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無論對於語言能力的形成或是對現實客觀化的看待方式，溝通的模式都會對兒童造成直接的影響。⁸

二 Oevermann 社會化理論的基本問題意識

在哈伯瑪斯理論工作的基礎上，Oevermann 完成他以語言學習與社會階級出身之關係的博士論文。⁹這本建立在標準化測量工具的量化研究著作，在他後來的學術歷程中完全被推翻。¹⁰1970年代Oevermann在柏林的普朗克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使他完全放棄量化研究方法，轉向「質性」研究方法的摸索與測試，最終由於研究「家庭內社會化互動」的需要，發展出序列分析的結構詮釋學方法。



在其眾多社會化研究相關著作中，筆者認為，他在2004年發表論文「社會化作為危機克服的過程」具體而微地濃縮了他一生在這個研究領域所提出的新貢獻。因此，本文將集中討論這個文本，以求論證的密度與完整性。

Oevermann 認為，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不能僅以停留在描述的層次為滿足，必須進一步達到解釋的層次，不能只是在收集資料後，予以進行範疇歸類 (subsumption)，而是要設法說明個案為何會變成個案這種情況，換言之，研究必須達到能夠解釋個案之所以能夠發生的結構動力。¹¹ 社會化研究尤其得注意到個案的獨特性，它與佛洛伊德對病人案例的分析具有結構的同質性，不能僅只是對個案資料進行單純的比較與分類。

如何解釋新事物得以出現的問題，使得範疇式的思考方式陷入困境，我們無法以法則性的方式思考新事物的出現，法則只會單調重覆同一事物。¹² 我們也無法以範疇分類的方式解決新事物出現的問題，只能以「結構式」、「過程式」的機制去解釋新事物為何會系統性地出現。¹³

Oevermann 舉韋伯的「卡理斯瑪」理論為例，卡理斯瑪的實踐跳脫常規與法則性，它單純只是出現了，一旦卡理斯瑪式的預言得到確證之後，它又反過來將其視為命定的，或用 Oevermann 的術語，進行重建。卡理斯瑪式的行動因而處於一種危機與常規的辯證之中。¹⁴

社會化本身是一個系統地產生新事物的過程，它依循一種過程的邏輯。由生物學的基礎出發，新事物首先產生於交配，交配或性的再生產使得父母親的基因重組在新的生命上。深受李維史陀結構主義的啟發，Oevermann 認為，性的再生產使得生物性層次的新事物的生產上升到社會文化的層面，從「自然轉向文化」，交配的雙方所形成的交配的關係後來轉化為新生兒日後社會化的環境。¹⁵



追溯文明的歷史軌跡，在父親被家庭化之後，家庭結構轉變為以父親、母親、小孩的三重位置關係為其核心，尤其在佛洛伊德所處的十九、二十世紀交接的歷史時期最為明顯。Oevermann 遵循佛洛伊德的術語，將此種在資本主義時代典型的家庭結構稱為「伊底帕斯三角關係」(Ödipale Triade)。¹⁶ 這個「家庭金三角」的伊底帕斯三角關係被 Oevermann 視為「社會化實踐活動的基本結構」。¹⁷ 性的再生產使得兩個不同的生活世界產生了綜合，並使新生兒處於一種對未來開放的過程之中。性的再生產創造出社會化具體的氛圍 (Milieu)，打開了一個假設性的世界，創造出一個可能性的迴旋空間。家庭社會化的前提是這個由性的再生產（交配）而來的伴侶關係，亦即，法律上所謂的「配偶關係」。建構配偶關係本身即是在建構新事物，同時也在為未來建構一個可能的具體的社會化的氛圍，它不僅打開了可能性，同時也充滿了機會與限制。理論上關鍵的是，這個配偶關係是否是一種個體化的伴侶關係，而不是威權家庭典型的性別宰制關係。¹⁸

三 「生活實踐」作為社會化的基礎

依照 Oevermann 的看法，新事物系統轉化的起始，是一個綜合了身體、心靈、社會、文化等特性的統一體，他不認為依照一般的稱謂，將它稱為「主體」、「位格」、「認同」、「自我」等等是適當的，他建議將之視為「生活實踐」(Lebenspraxis)。「生活實踐」不僅具體化於某一個人存在的傳記之中，亦即，存在於某一個人的社會化過程之中，同時也存在於一個家庭的社會化實踐。家庭基本上是社會化之關係的體系，它的基本結構是「伊底帕斯三角關係」。



「生活實踐」的概念放棄了主觀主義的意識與意向性的面向，引用佛洛伊德的案例，Oevermann 認為，社會行動的實踐宛如被催眠，它並非純粹的生理學現象，也不是完全由心智所控制。同樣地，人格也並非是累積的，它必須被設想為一個身體、心靈與社會性互相關連的個案結構的法則性。「生活實踐」不是一個物化的概念，必須以動態的觀察方式來掌握。它是生命的中心，類似 Plessner 所謂的「位置性」(Positionalität)。它是一種圍繞著身體，與生物性的肉身息息相關的，無意識的主體性。

生活實踐並非靜態的，它背後有一種結構的動力在推動。Oevermann 在 1990 年代之後的許多論文中，都描述了一個獨特的生活實踐的理論，他將之界定為「決定的強制與論證的義務之矛盾統一體」。¹⁹ 行動的主體性在於面對未來眾多可能的選項作出選擇，但是這些決定卻經常是在被強制的情況作出，事後又必須加以論證，論證並不是在作決定的當下作出，而是被延宕的，但是卻必須自己對自己自圓其說。因此，想要以一般的理性行動的社會理論，或是以經濟人為基本假設的「理性選擇」理論來掌握生活實踐的結構動力，無異緣木求魚。

被迫得作出決定是日常生活常見的危機，一旦決定都是毫無猶豫地作出，遇事不加以考慮作出回應，那種決定就變成了常規。危機與常規構成了生活實踐的兩個極端，生活實踐的結構動力來自於這種「危機與常規的辯證」。在日常生活中，並非每一個作決定的情境都是危機，決定的危機往往被行動者以常規的方式解決。相反地，日常生活中，危機並不常出現。只有在常規失效時，危機才會被行動者遭遇到。一旦問題被以證明有效的方式重複解決，那就不存在危機。常規往往只是被加以確證的危機解決的方式。

Oevermann 以「序列」的方式來思考生活實踐的實際行動。每一個被迫得作出決定的情境，都是重要的序列位置。藉由「



紀錄」，我們得以回溯序列的排序，並重建序列的結構法則。決定性的情境典型構成是它依據產生的規則打開了眾多的可能性，因而形成作決定的危機。在下一個序列的位置，決定早已客觀地被作出，危機也被卸除。透過分析序列的位置之間的聯結，我們可以重建個案結構的結構法則性。它主要由兩個參數構成：參數（一）產生的規則；參數（二）選擇的原則。對生活實踐的序列性的假設構成了客觀詮釋學序列分析方法的方法論基礎。²⁰

Oevermann 強調危機的重要性，危機打開了生活實踐開放性。我們必須將危機視為常態，將常規視為例外。因為一旦我們將常規視為常態，那麼就直接消除了生活實踐的自主性的要求，而使生命成為隨波逐流的常規的外力決定的反應。理性行動訴諸一個常規的一般性的假說，一旦人們都完全按照理性在行動，主體將蒸發於常規的順從性之中。

四 危機與社會化

社會化的過程必須被視為一個充滿危機的過程，在不斷地克服危機之中，個人才有發展出自主的生活實踐的機會。社會化基本上是一個危機克服的過程。在結構詮釋學長期的研究中發現，個體由出生到成人的階段，主要是由四重的危機構成的，Oevermann 將之稱為「更替的危機」(Ablösungskrisen)。²¹

首先是出生的危機，對母體而言，則是懷孕的危機。出生是懷孕過程危機的終結，一個正常而順利的生產過程可以給新生兒帶來一種身體的記憶，產生一種結構性的樂觀主義的慣習形成。生產過程不順，如早產兒，則可能伴隨著一種無意識的「結構的悲觀主義」。²²



個別的生命出生之後，則進入一個 Oevermann 稱之為「母子共棲」(Mutter-Kind-Symbiose) 的階段。與母親的共棲關係是一種無條件的許諾，守護著無助的嬰兒。根據部分學者的研究，嬰兒在三個月大時尚無法分辨周遭的事物。大約八個月大時，嬰兒才開始能辨識環境中的對象物，區分媽媽與陌生人。嬰兒的行為也產生變化，他不再微笑，對陌生人反應出焦慮的樣子。嬰兒開始只認媽媽的臉，以母親為愛戀對象。²³ 嬰兒也慢慢在語言能力上學會說「不」，這標誌著最初的自我與他者的分離。

附帶一提，在這種「母子共棲」的關係中，母親陷入一種自戀式的對象固著之中，並呈現出一種心理倒退，退回自身童年的記憶痕跡。它可能造成生產後的沮喪，或忽視她的配偶。她的伴侶必須關懷與注意，避失這種沮喪狀態長期持續下去。而嬰兒如果能夠脫離對母親的依賴，在互動中，父親就會開始成為重要的關係人。²⁴

這時便進入第三重的危機階段，亦即，「伊底帕斯三角關係」，這個家庭三角關係，在社會化過程中將會發生非常大的作用。第四重的危機則是「青少年危機」，重要的課題轉移到個體必須脫離原生家庭。

Oevermann 認為，社會化的一般理論聚焦於個人自主的行動能力的層次，成為一個與自己認同的主體。它也必須成為一個有認知能力的主體，讓自己的認知、語言、知覺、情感的各種能力發展起來。最後，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是一個創傷化的過程，它得慢慢在生命史的發展中修復或療癒這個創傷。²⁵

為了深入理解這個危機克服的過程，Oevermann 構築出一套危機理論，將危機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類型，並搭配四種經驗模式（自然的、美學的、身體的、宗教的）。他認為，經驗是在危機克服的過程中構成的，如果人們只依循常規行動，他是無法獲得經驗的，而只能靠著他人已經製造的經驗生活。



這三種危機的類型對理解社會化過程十分重要，以下逐一討論。

第一種危機是創傷 (Trauma) 的危機，Oevermann 認為，這就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 (Peirce) 所說的「brute facts」(赤裸裸的事實)，當個人遭到外在無法預見的事件或內在毫無準備的事實侵襲時，這便構成了創傷的危機。這種危機可以是痛苦的傷害或是快樂的出神式興奮。在每一種情況，都是由於一個不確定的事件 X 突然降臨，而個人不得不作出回應。

Oevermann 將自然經驗與身體經驗歸屬於這種創傷的危機之下，某些個人無法決定的社會事件也帶有自然經驗的性質。

第二種危機是「決定的危機」。它是由生活實踐自身所引入的可能性的假說的建構所構造的。它強迫行動主體必須從可能性的期待中作出選擇。對應於決定的危機的是宗教經驗，面對無法止息的確證的問題，危機的解決被延宕，被延遲到很久之後，因為它在此時此刻無法解決。²⁶

第三種危機涉及到美學經驗，Oevermann 稱之為「繆思式的危機」。它是由一種自給自足，只以自身為目的的知覺所引起的，它是一種自我有效的行動，而非某種目的導向的實際行動。²⁷

Oevermann 以這套危機類型學重新審視社會化的過程，他認為，小孩是美學經驗的主角，愈小的孩子愈具有美學經驗的純粹形式，小孩活在一種美學經驗的氛圍之中，他會自動自發地創造出繆思式的危機。成年人必須在實際的壓力與責任的重擔之中，以某些繆思式的行動來跳脫實踐之流，例如：作白日夢、參觀美術館、閱讀純文學、散步或單純地觀看某物。兒童則自然而然地處於這種繆思狀態。Oevermann 經常舉的例子是，小孩無所求地觀察螞蟻在石頭上行走的途徑。²⁸

因應這種繆思式的行動，Oevermann 認為，理想的學校型態在於引發繆思，藉由繆思創造出危機，以一種無目的的方式傳遞知識。²⁹



至於創傷性的危機，很不幸地，小孩在其自身看來，它不斷地遭遇危機與災難，因而常常哭泣。面對不斷更替的「赤裸裸的事實」，小孩必須學習自己走出這些危機。但是，如果這些危機超出小孩的能力所能負擔的，就會轉化成「苛求」，苛求會使小孩退縮、沮喪、提早放棄。美學經驗就此讓位於抗拒的經驗。

決定的危機建立在一個行動的前提上，它假設行動者早已獲得足夠的自主性，他可以期待與建構他自己的未來。這在「青少年危機」的階段特別明顯。這是脫離童年，邁向成人的關鍵時期，它的主要難題在於「成為主體」，因此家庭內的衝突成為結構性的常態。

決定的危機需要確證，但確證卻往往只在彼岸的世界且往往僅僅只是一種希望。在確證的動力中，「成為主體」的條件在於解決危機，得到確證，這需要某種無與倫比的自信，Oevermann 將之稱為「導向自我的卡里斯瑪化」。在解決青少年危機的最後階段，這種自我信任必須早已存在。

成年之後，生命史確證的動力往往轉移到職業的生涯與專業的成就。在歐陸的歷史脈絡中，Oevermann 指出，成年人的確證主要來自三方面：第一，成為父母，參與到性的再生產；其次，取得職業上的成就，這是確證問題的核心；最後，參與促進公共福祉的義務，這是現代公民的基本要求。³⁰

五 伊底帕斯三角關係的結構原型

我們不難發現，在客觀詮釋學的社會化理論之中，家庭金三角佔據著關鍵的地位。社會化的結構條件是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所形成的家庭關係。在佛洛伊德、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的研究中，無論是權威人格或種族主義，性別宰制或威權政治文化的根源，都來自這個伊底帕斯三角關係的結構動力。³¹



Oevermann 認為，伊底帕斯三角關係的結構邏輯或結構動力是社會學的社會化理論最核心的問題，它是由三組二元關係交疊而成一配偶關係、母子關係、父子關係。這些關係的獨特性在於他們都不是角色關係。受到藤尼斯 (F. Tönnies)、Parsons 理論論述的啟發，Oevermann 指出，家庭金三角之中的兩組基本的關係，亦即，伴侶關係與親子關係都不是角色關係，反而他們是擴散 (diffuse) 關係的二種原型。

在社會學的一般論述中，角色 (role) 是理解互動與社會關係的重要概念，它通常被設想為，對行動者佔據在某個社會位置上的行為的期待。Oevermann 摒棄了上述角色理論的典範，他強調，角色關係的理論無法解釋需要互動兩造生命完全投入的關係，後者被他借用 Parsons 的術語，稱之為「擴散關係」。³²

家庭金三角的關係運作依賴的是擴散關係，而非角色關係。配偶之間不是一場角色扮演的遊戲，而是要求整全的生命投入。角色關係是一種帶有契約關係性質的互動結構，擴散關係則涉及到兩個完整的人。親子關係、伴侶關係 (配偶) 都不是角色關係中的角色位置可以替代的。若是缺乏這些擴散關係中具體互動的人，家庭結構就可能完全瓦解，或發生結構性的改變。³³

擴散關係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是其基本的結構條件，同時它有其身體的基礎 (例如，血緣)，它建立在一種無條件的信任的形式上，同時它還無法解約而且通常持續一輩子，或者，沒有期限。擴散關係被深深地烙上一般化的情感連帶的印記；角色關係則可以解約，而且一般而言，也有期限。

伊底帕斯三角關係是在這種擴散關係的結構條件下構成的，同時它具有一種根本的對立性：配偶關係建立在性的再生產所隱含的原慾的相互性上；與之相反，親子關係建立在亂倫禁忌上，親子的性關係是被各種強制性的規則嚴格禁止的。因此，「愛情」的概念對社會化理論而言是無法使用的，配偶之間的「愛」



和親子之間的「愛」性質完全不同。愛情具有其原慾的身體性基礎，在社會化研究中，完全不能聚焦於愛情上。更進一步而言，母子之間的情感連帶也與父子之間的性質截然不同。³⁴

這種情感連帶性質的結構差異構成了家庭金三角結構的動力。由三組二元關係所構成的伊底帕斯三角關係，它的基本結構問題在於每一個二元組合都將三角關係的第三人排除，每一個二元組 (dyad) 的成員都相互將對方視為唯一，從而客觀上拒斥了第三個家庭成員。配偶關係拒斥了小孩，母子關係拒斥了父親，父子關係拒斥了母親，但是每一個「第三者」卻又同時參與了這個家庭金三角關係的運作。

結構上，家庭金三角是家庭關係中三個位置相互之間的緊張關係。每一個位置的佔有者都得承認並容忍其他兩位位置佔有者彼此之間獨佔性的情感連結，以致於自己被排除，同時又有資格與他們個別建構獨佔性的情感連結。這個基本矛盾帶來一種「結構性的嫉妒」，因為永遠有一個「第三者」被排除在外。³⁵

這種「結構性的嫉妒」對家庭社會化過程中的小孩感受尤其強烈，它充分理解到，在家庭金三角中，它是被排除於配偶關係之外的。而父親、母親只是在親子關係中被排除的一邊，在另一邊他們仍可構築二人組的關係。Oevermann 認為，在伊底帕斯三角關係中產生出一種結構的動力，它促使小孩體會到它必須儘早找到自己配偶關係的伴侶，但如此它也必須儘早脫離與父、母的二人組關係。³⁶

小孩位置的佔據者處境尤其艱難，除了性別認同的問題之外，它被迫得作出自主性的決定，以解決這個「結構性的嫉妒」的難題。面對家庭金三角內在的基本衝突，小孩也必須在危機克服的過程中學習獲得行動主體的自主性，只有在它能作出自主性的決定之後，它的自我才算初步形成。³⁷



這個伊底帕斯三角關係的理論模型可以提供經驗研究的參照點，讓我們得以比較不同的文化之間、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社會中不同的結構氛圍以及不同的個人生命史之間的異同，從而豐富社會化研究的經驗研究成果與理論擴延。

六 學校的理想型態

這個由危機的生活實踐的結構邏輯出發的社會化理論，不僅可以解釋一個個體的生命之自我的形成過程，同時，可以擴大討論到在次級社會化過程中，學校所該扮演的角色。在 Oevermann 的理想中，學校可以填補家庭社會化過程中所留下來的縫隙，尤其在文化轉變為書寫文化之後，家庭的文化傳遞工作便轉移到學校，基本的閱讀、書寫與計算能力變成只能由學校的學習中獲得。³⁸

學校因而轉化為「危機克服的替代性解決的場所」³⁹，它的基本工作是傳遞一種書寫文化的知識，但是它也隱含著一種教條主義式的僵化的危機。對於學習主體而言，知識是在克服不同程度、不同階段的各式各樣的危機之後，才能真正變成屬己的知識。學校如果在方法上不顧及這種危機式的教學，而只是僵化、制式的傳遞知識，學習的途徑將不會是通往知識的獲取，而是結構地轉化為教條的傳遞。

在學校的知識傳遞過程中，關鍵在於如何透過一種「方法的懷疑」誘發學習者的好奇心。學習的成效在於這個學習者的好奇心。前面已經討論過，好奇心是美學經驗的基本形式，它所引起的是一種繆思式的危機。

好奇心是教學行動是否能建立起一種師生之間專業的聯結的先決條件。Oevermann 認為，這個專業化的要求在德國不算成



功，義務性的學校教育往往使得學校成為抹殺好奇心的地方。法律強制的學校義務教育不但不注重好奇心的培養，而且客觀上從根本否定它，以致於學校教育往往是在培養一種下屬的順從主義。每個用功的學生都明白，不能偏離學校所設定的目標，專注於自身知識的好奇心所引發的危機，並非學校教育的重點。⁴⁰

對學生而言，學校陷於一種角色關係與擴散關係的雙重結構之中。在脫離家庭之後，小孩在學校中學習他人生的首次的角色關係，亦即，它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是一種不對稱的權力關係，而理想的師生關係不應建立在這種權力的極度不對稱上。學生努力扮演他的社會角色，卻往往將與老師之間的關係等同於其與父、母之間的擴散關係。因而，學校使學生處於一種角色關係與擴散關係相互矛盾的模糊 (ambiguity) 狀態之中。⁴¹

理想上，師生關係是一種專業的工作聯盟，適度的權威是必要的，完全的宰制則與教育的目標，培養知識學習的主體，背道而馳。Oevermann 認為，師生之間是在一種角色關係與擴散關係之矛盾統一中完成的弔詭。⁴² 這個理想型態雖然在實踐中有其難度，但我們仍應將之視為教育的理想奮力逼近。最糟的情況是，學校教師以一種準官吏的姿態出現，將學校轉化為一種阿杜塞所說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重要環節，形成教學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更不可能產生師生之間專業的工作聯結。⁴³

無論師生之間、同儕之間都得在角色關係的基礎上，尋求一種擴散關係式的共同體的聯結，這是建立專業化的工作聯結的前提。學生之間的同儕關係也是重要的一環，它的理想型態是一種平等合作的擴散關係，共同分享其無條件的互助合作。最忌諱的是相互猜疑、彼此競爭，破壞共同體的夥伴關係，使落敗的一方喪失學習的興趣，而打倒他人的勝出者陷於孤立。

理想的教學方法在古代的中國與希臘，都早已被當時卓越的思想家提出過，這便是在西方被稱之為蘇格拉底式的「催生法」。



它的先決條件是學習行動中內在的動力，亦即，好奇心。小孩原本就具有好奇心，在學習的過程中，重要的不是誘發它，而是避免在一種亞洲式的過度保護與積極干預中完全抹殺好奇心。知識獲得的過程同時也是獲得主體行動能力的過程，更是一種建立行動自主性的過程。在好奇心中，小孩結構性地承認它的無知，也同時蘊涵一種追求知識的動力，因而能夠與提供方法的老師，形成一種工作的聯結，亦即，學習的共同體。另一方面，老師則應給予學童輕微的危機，給予問題並將之導向一個獨立解決問題的過程，讓它自己去克服危機。

七 研究的未來

專攻媒體社會化的德國社會學家 Tilmann Sutter 認為，社會學理論的古典問題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社會化研究是回答這個問題無法迴避的基本工作。他指出，德國的社會化研究看似成果豐碩，其實卻是陷入一種理論停滯的狀態，他甚至特別指明，魯曼式的系統理論無法建立經驗性的社會化研究。⁴⁴

台灣的情況似乎更糟，就筆者有限的認知而言，社會化理論與經驗研究在台灣的社会學完全是處於待開發的狀態。社會化研究彷彿被劃入教育學門，很少有社會學家參與其中，這使得台灣社會學的理论深度與視野都受到了限制。

筆者雖非專攻社會化研究的專家，但在社會理論的層次，必須大聲疾呼，大家應不分學派共同專注這個「自我如何形成」的理論問題。個人認為，Oevermann 的社會化理論與經驗研究可以提供我們很好的參照。

Oevermann 則指出，一般社會化研究的致命傷在於研究方法，社會化不適合以標準化操作的方法進行，他進一步提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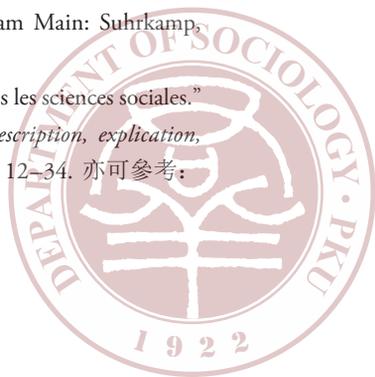
列分析與生命史方法的重要性，一種對自然、非標準化的紀錄進行嚴格的個案之意義結構的重建，才是社會化研究的正途。⁴⁵

社會化，作為危機克服的過程，本身的結構邏輯剛好與社會學研究傳統的標準化操作的方法論嚴格抵觸，無法找到妥協、折衷的解決方案。社會化研究需要一套能夠重建潛在意義結構的方法論，來分析家庭互動的紀錄、教學的紀錄、個人生命史的紀錄等等各種經驗材料。

在一種發生的結構主義式的方法論的幫助之中，研究者方能確立序列行動中發生的規則與個體作出決定的選擇的原則，並解釋自我如何形成以及新事物如何出現，而社會化過程是如何在危機與常規的兩極中系統地出現。

注釋

- 1 請參考 Detlef Garz, *Theorie der Lebenspraxis: Einführung in das Werk Ulrich Oevermanns* (Wiesbaden: Springer, 2015).
- 2 Hans-Josef Wagner, *Krise und Sozia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Humanities Online, 2004).
- 3 Jürgen Habermas, *Thesen zur Theorie der Sozialisation: Stichworte und Literatur zur Vorlesung im Sommer-Semester 1968* (Frankfurt am Main: 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68), S. 2.
- 4 同上。
- 5 同上, S. 3.
- 6 同上, S. 9.
- 7 同上, S. 47.
- 8 同上, S. 48.
- 9 這本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是J. Habermas。
- 10 Oevermann, *Sprache und soziale Herkun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 11 Oevermann, "Il n'y a pas de probleme de description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In Ackermann et al. (Hg.), *Decrire: Un impératif? Description, ex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EHESS, 1985), 12–34. 亦可參考：



- 黃聖哲，〈意義的結構：結構詮釋學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收錄於黃瑞祺編，《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臺北：松慧，2005），274。
- 12 Oevermann, Genetischer Strukturalismus und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 der Erklärung der Entstehung des Neuen. In: Stefan Müller-Doohm(Hrsg.) *Jenseits der Utopie. Theoriekritik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1), S. 267–336.
- 13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55.
- 14 黃聖哲，〈危機與宗教性：論 Oevermann 的宗教社會學〉。《台灣社會學刊》第59卷（2016），187–218。
- 15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56–157.
- 16 這個術語無論在佛洛伊德或 Oevermann 的使用中，都早已脫離其希臘神話的根源，讀者不宜以一般教科書中所談論的「戀母情結」來猜測術語的意涵；另外，在社會學理論的課堂教學中，筆者為求教學的效果，間或稱之為「家庭金三角」。
- 17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57.
- 18 Bourdieu, *Masculine Domin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x Horkheimer, “Family and the Authority”, in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72), 47–128.
- 19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60.
- 黃聖哲，〈意義的結構：結構詮釋學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收錄於黃瑞祺編，《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臺北：松慧，2005），287。
- 20 請參考黃聖哲，〈意義的結構：結構詮釋學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收錄於黃瑞祺編，《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臺北：松慧，2005）。
- 21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63.
- 22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 Lucius & Lucius, 2004), S. 164. Hans-Josef Wagner, *Krise und Sozia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Humanities Online, 2004), S. 368–370.
- 23 Hans-Josef Wagner, *Krise und Sozia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Humanities Online, 2004), S. 370.
- 24 Hans-Josef Wagner, *Krise und Sozia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Humanities Online, 2004), S. 371.
- 25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64.
- 26 請參考黃聖哲,〈危機與宗教性: 論 Oevermann 的宗教社會學〉。《台灣社會學刊》第59卷(2016) 187–218。
- 27 詳細的討論請參考黃聖哲,《美學經驗的社會構成》(台北: 唐山, 2013)。
- 28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168–169.
- 29 同上。
- 30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71–172.
- 31 Freud, *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Studienausgabe Bd. V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72).
- Max Horkheimer, “Family and the Authority”, in: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72), 47–128. Adorno, “Studies i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Adorno, GS 9.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 32 Oevermann, Ulrich, The analy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ommunity (“Gemeinschaft”) and society (“Gesellschaf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n education for European citizenship. In Alistair Ross (ed.) *Developing Identities in Europe* (London: CiCe Publication, 2000), 37–61.
- 33 詳細的討論請參見黃聖哲, 社會性的雙重結構, 《社會理論學報》第15卷第1期(2012) (新加坡: 八方文化)。
- 34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73–173.



- 35 詳細的討論參見 Oevermann 有關“家庭理論的模型”的英文演講稿，Oeverman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Family Structure, Fellow Lecture at the Hanse Wissenschaftskolleg Delmenhorst, 7. Jun. 2000.
- 36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73–174.
- 37 同上，S. 174。
- 38 同上，S. 176。
- 39 同上。
- 40 同上，S. 177。
- 41 黃聖哲，社會性的雙重結構，《社會理論學報》第15卷第1期（2012）（新加坡：八方文化），128。
- 42 同上。
- 43 Louis Althusser, 〈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列寧與哲學》，杜章智、顧良譯（臺北：遠流，1990）。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ew Left Books, 1977).
- 44 Tilmann Sutter, “Sozialisation als Konstruktion subjektiver und sozialer Strukturen”,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93–94.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7).
- 45 Oevermann, Sozialisation als Prozess der Krisenbewältigung, in Dieter Geulen und Hermann Veith (Hrsg.), *Sozialisationstheorie interdisziplinär*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4), S. 178.

